

# 贴近生活，发展中国思想史特色

刘志琴

《炎黄春秋》杂志社

21世纪大陆文化研究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研究的视角下移到生活领域，新兴的社会文化史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人文学者的兴趣，这在哲学界已有敏锐的反映。从新世纪伊始，伴随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倡议，就有建立人间哲学的呼声，有的提倡让哲学融于生活，保持与生活同步前进；有的认为生活是历史的本体；有的把传统儒学归结为生活儒学；有的认为中国思想史应是植根生活的礼俗思想史；有的还提出外国学者研究汉学必须从生活文化入手的见解。这些来自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思想史学者，都把注意力从关注“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社会史的领域开拓思想资源。长期被观念史拒之门外的社会生活，一跃而为思想史学者关注的主题。从生活文化发掘思想特色，是建树中国气派的思想史的重要途径。

## 一、生活，富集文化特色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链条上，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所以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

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饮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体生动的样式和内容，所以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休闲娱乐、日用器物，无一不是文化的载体，最具体、生动地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思潮。

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有着种种不同的特色，从儒家伦理到用筷子吃饭，林林总总，异彩纷呈，最大的特色是在于，生活方式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中国人的生活意识，对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认识这一特色是把握中国思想史特性的重要途径。

## 二、中华文明初始，凸显生活意识

生活是世界性话题，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不分地区和种属都要为自己的生活源头、历史的开端作出自己的解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生命和生活的缔造者不是上帝、僧侣和神仙，而是生活在人间与自己血脉相连的黄帝和炎帝。古史相传，在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从炎黄二帝伊始才有了衣服、旃冕、房屋、舟车和播种耕作，蒸谷为饭，虽然这些传说是半实半虚，却是人类生存历程的反映，现代人类学也证明从发明熟食、制衣到使用文字，如实反映了人类生活进化的程序和文明的肇始。中国以远古的传说，明确地告白，创造生活的是人不是神。先民们凭借口耳相授的传说，把衣食住行这人类进化的产物，赋以具体生动的个体创造，贴近生活解释先人的活动，从而把群体创造附会为个人的行为，这是人类幼年时代的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在发明生活方式的同时，又

赋以神圣化的个人崇拜，尊崇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以养我、育我的生命之基作为中华文明的滥觞，所以中华文明初始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固定化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炎黄二帝。从传说时代就以现实生活而不是神物灵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这是突出生活意识的体现。

炎黄二帝在中国的出世不凡，不仅因为他们是教民衣食住行的始祖，还由于他们发明的“饮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的本源。古人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揭示了社会制度是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中产生；法的古字为“彝”，也是从分配米、肉、丝，衣食用品的秩序中发源，虽然这不乏有后人的附会之处，但这有关“礼”、“法”制度生成的解释，因为植根自然生态和生活意识，世世代代传沿不息。

### 三、寓教化于生活，是传统文化结构性特征

“生活”在古人的观念中并不复杂，遍查它在经史子集中的含义，无非是活着，过日子的一种表述。古人对生活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将服食器用理念化，形成百姓日用之学。

所谓百姓日用这是古人对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器物的用语，自古以来就受到各种学派和经典著作的重视，从《尚书》的“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诗经》的“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易经》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等经典著作莫不表示对服食器用的关注。有关“服”、“食”、“器用”的用词，出现在《论语》中有111次，《孟子》218次，两者相加共有329次。与此相比，在这两部书中“礼”字出现138次、“德”字75次。服食器用以如此高的频率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甚至高于儒家一贯崇奉的“礼”和“德”，不能不是高度重视生活的反映。

士大夫们对教化民众生活有强烈的使命感，诸

子百家没有哪一家不对风俗民情问题不表态的。孔子论学，大至德和礼，小至吃饭，行路、待客、排座次、放碗筷、喝汤、吃肉都不厌其详地循循教诲。早在先秦，思想家们就为生活方式提供了思想理念，荀子明确宣告：“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这就是说，德、位、禄必须相称，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有禄才有用，道德表现、社会地位和财禄器用一体化，由此构成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论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就其涵有的文化因素来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就其构成来说，它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一体的内容，正是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构成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文化模式中，以物可以观位，以德又可以量物，贵贱之别不仅溢于形表，道德上的良莠也力图物化为消费生活的等级之别。

日用器物的制作和消费本是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欲望，在中国却与地位、伦理融为一体，致使生活方式充分伦理化。服食器用不仅是消费品，也是非文本的伦理教本，寓教化于生活日用，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

### 四、百姓日用，是观念之源

生活的主体是人，服食器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生活与观念是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同领域的行为和反映，在认知方面有感官和思维，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差异，所以这两者各有相应的范畴，从而有一定的间距，并不等同。但在百姓日用之学中，生活与观念之间相互渗透，甚至混为一体。

纵观一部思想史，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从日常生活中阐扬此中的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从而创造出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如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形下等等。

其实质就是将伦理观念寓入日用器物之中，一事一物都要仔细琢磨出其中的义理，宋儒所谓“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日用之间，以敬为主。”“日用之间，只在这许多道理里面转。”“日用之间，大伦大端。”种种说教都力图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

这种思维习惯强调感悟的认知方式，宋明理学认为道器的上下之别，可以用“格物致知”的方法来贯通，亦即是从普通器物中体认天理人情的无所不在，能做到这点就能使下学上达，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

日用器物本是人类劳动的生产产品，按照人们的意愿，用自然界的原料加工做成适合人们使用的器物，以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这是社会的文明和生产者聪明才智的表现，就这些成品本身乃是无知无识的客观存在，但在理学家的心目中则赋以道的含义，道是什么，是伦理化的观念，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服食器用在这些思想家的眼中，不仅是供人温饱，更是形成理

念的本源，直接从形而下体认形而上，使形上与形下在感悟中合一。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意，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的形上学。在这实践的形上学中，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思辨演绎，而是基于人人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这是中国思想史一系列概念的特征。

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的儒家思想，创造了中国特有的百姓日用之学，扩大并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覆盖面，由此也培育了生活方式伦理化的普遍心态，使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高度契合，难分难解，在社会转型之际成为道德盛衰的风向计。士大夫们自古以来，就有把国运盛衰和名教兴亡的观察点下移到民众生活中考察的传统，每当王朝末世，有识之士往往从关注民生民风中创立新的学说，推动思想史的发展。因此在生活领域表现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成为治国理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延伸和发展。因此，通过生活文化与观念形态的互动和变迁，阐明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历程，是建树富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史的可行之路。